

目藏漢籍善

上册

中華書局

目藏漢籍善本書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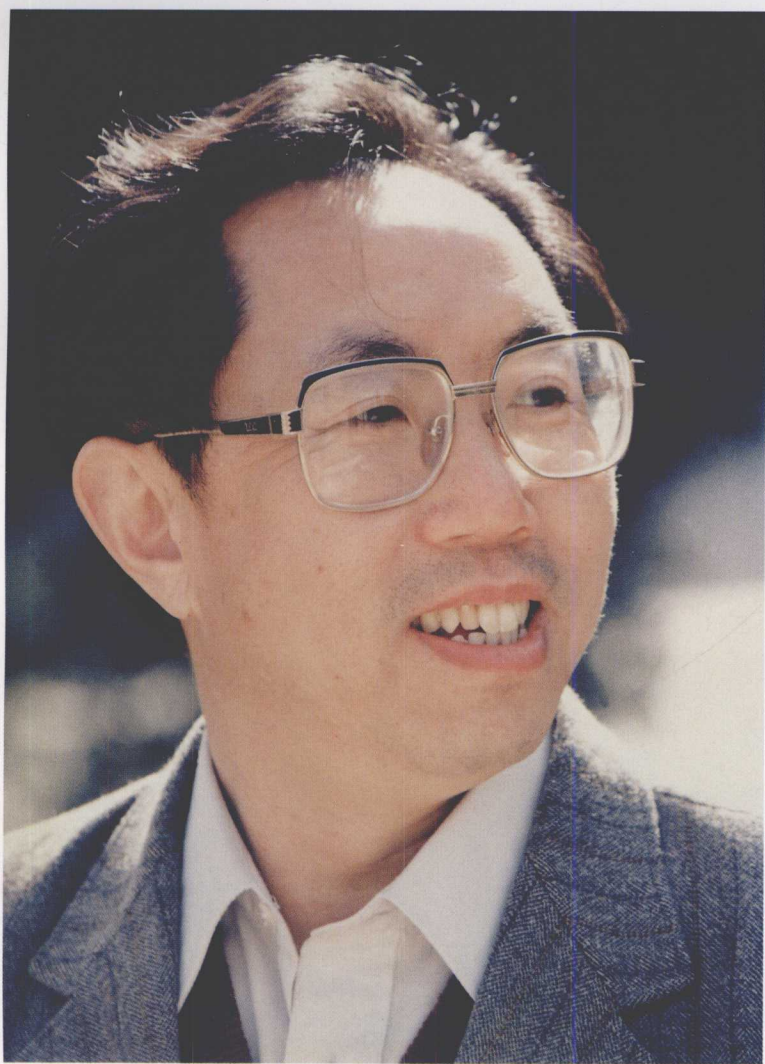
上册

經部 史部

嚴紹璽 編著

中華書局





本書編著者 (1996年 56歳)



在宮内廳書陵部讀書 (1985年8月)



宮内廳書陵部夜色外景 (2001年11月)



在静嘉堂休息室
(2001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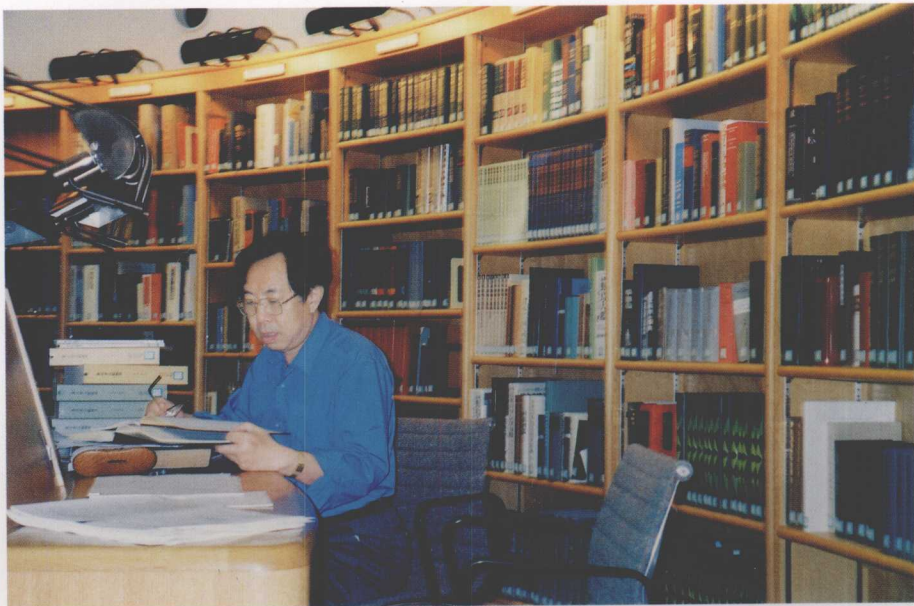
岐阜縣羽島大須觀音——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末漢籍國寶儲存地
(2002年2月)



在國立東京大學東洋
文化研究所讀書
(1985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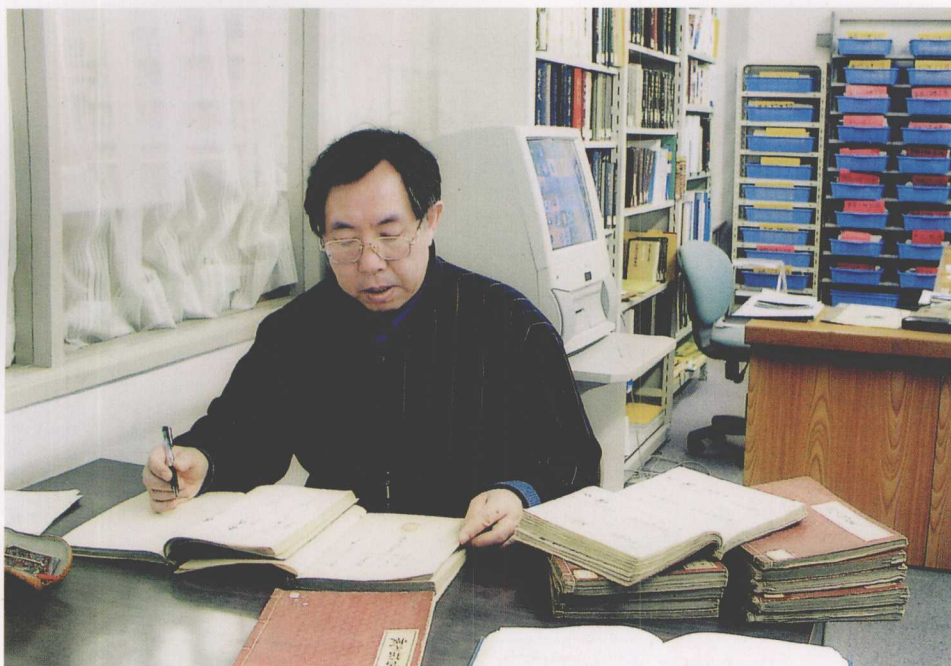
在國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中心讀書
(1985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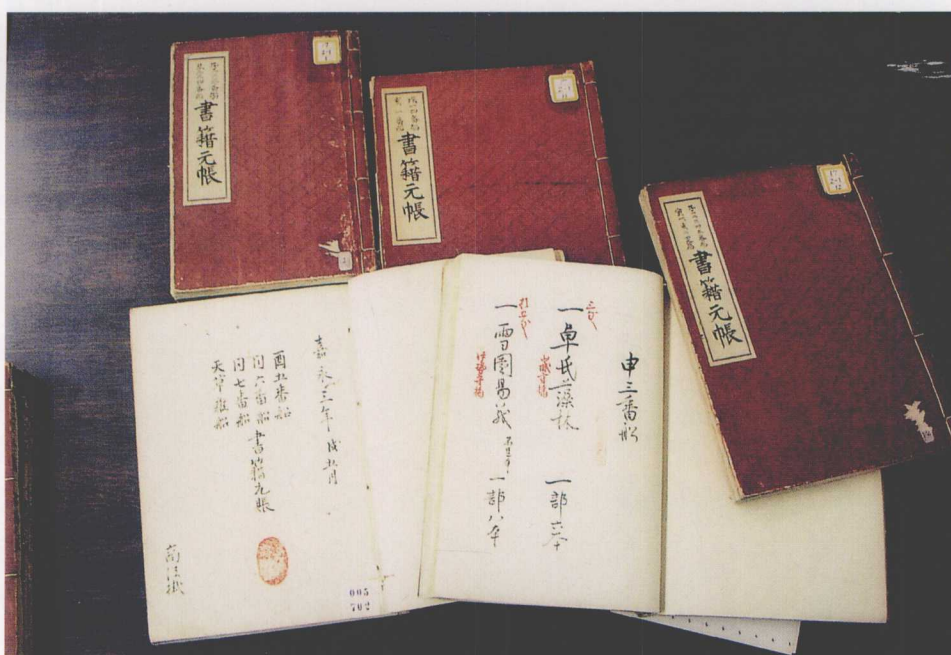
在日本文部科學省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讀書
(1994年9月)



在國立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讀書
(1992年8月)



在長崎縣立圖書館讀書
(2002年3月)



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前期由長崎港上岸的漢籍登錄冊
(2002年3月)



中世紀日本漢籍儲存和學習地——足利學校
(2001年9月)



在日本慶應大學斯道文庫，本書編著者向本書日文序作者
尾崎康教授請教 (1998年9月)

序

任继愈

鴉片戰爭前，有時代危機感的龔自珍，關心世界大事，記載中日學者訪求佚書的交往。此後，黃遵憲、楊守敬在日本訪求海外漢籍，曾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前輩學人訪求海外漢籍，他們的目光着眼於“訪書”，尋訪中土失傳而東土現存的珍本古籍，而沒有從文化交流的大局作進一步系統的探討。看到北京大學嚴紹盪教授的新著書稿《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心開目明，十分欣喜。

作者用力之勤，功力之深，超過前人。他歷時十四年，往返中日兩國十餘回，利用一切的機會，遍訪日本公私藏書機構，廣泛接觸日方的漢學家。以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博得日本漢學家們的欽重，因而能夠接觸到一般讀者難以接觸的善本珍本。有利的外緣再加上他為探索文化交流現象的宏願，鍥而不捨的毅力，達到了文獻整理的新天地。

中國的文化繼承，有述而不作、以述為作的傳統。後世學者為增加當時社會發展的新內容，有時故意進行篡改，使“六經注我”。越是流行和通行的古籍，其原貌改易越多。偽經偽史也往往因此而孳生。傳入日本的古籍，得以當時傳入的原貌保存下來，這對於我們中土學者校勘原著，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也應看到，中土典籍歷經改易，也屬事出有因，其失真之處，有時乃有意為之，亦自有其時代的特色與時代的價值，不能以其有失原貌而輕視其時代的價值。

舊的文獻學者，如乾嘉大師們，對古代文獻的整理做過傑出的貢獻。但他們畢竟是古代的學者，缺乏歷史發展觀，也缺乏現代科學方法的訓練，其缺點是就書論書，沒有站在更高的角度觀察日本的漢文書籍對兩國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蘊藏着深層的涵義。嚴紹盪教授編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體現了現代學者治學的方法，透過中日漢籍交流的現象，揭示出文化交流的脈絡。讀此書，不僅廣其見，也能助人開思路。

1982年，國務院召開全國古籍整理工作規劃會議，決定編輯具有中國特色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以山西趙城金藏為底本，參照另外八種版本校勘，標出各本異同。八種版本中的《資福藏》，國內已佚，是楊會文由日本購得，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在歷代傳世的《大藏經》中，又增加一個新版本。這是中日文化交流取得良好成績的最新見證。

中華古籍流散到海外，有的出於正常渠道的公平交易，這是值得稱道的；有的並不是由正常渠道，而是由於中國藏書家的不肖子孫貪圖近利而被貶抑價格售出的；也有

一些是被掠奪出境的。就文化遺產本身來說，一切有價值的文化成果（書籍也在內）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為人類所共享。但是，身為文化的創造者和所有者，眼望着祖先的遺產流散到天涯海外，自己檢尋反倒要請求別人的允許！嚴紹盪教授在本書中敘述了訪問日本靜嘉堂藏書的心情，每個愛國知識分子都會引起同感，心情複雜而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只有經歷過多災多難的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才能體會出來的。纂輯於十五世紀的《永樂大典》，是當時最大的一部類書，1900年八國聯軍佔據北京時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我們光有愛中華民族的熱情還不夠，還要有一個足以保護祖國文化遺產的強大的國力，才能保住它。

文化交流的雙方，其水平的高下關係到交流的主要流向。揆諸中外史實，總是文化水平高的一方流向文化水平相對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往往成為“接受者”。本書中所記，中日文化交流以隋唐為最盛，唐代的文化水平明顯地高於同時代的日本。後來歷經宋元明清（初），其勢頭不減。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的文化典籍、典章制度、哲學思想等對日本有可資借鑒處。鴉片戰爭後，中國國勢不振，文化水平特別是科學技術方面，在世界文化大國中處於落後地位。中國典籍不再呈現隋唐宋元明清（前期）滾滾東流的勢頭，這時的知識分子反倒赴日本尋求新知識，翻譯新典籍到中國來。

國際交流，有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三個方面。經濟效益是內在的推動力。本書中指出，日本江戶時期，即我國的明末和清代的前中期，中國出版的新書，有的在兩三年內便在日本流通，主要的動力是經濟利益推動，書商有利可圖。像《太平御覽》在中國是禁止出口的，却也能成套地運到日本。當時的日本政府，曾明令禁止海外貿易，但長崎的書市並未停止。只要有利，商人會主動進行。文化交流可以增進雙方的瞭解和友誼，也能促進經濟交流，而政治交流則是其它交流的保障。有時，雙方都有交流的願望和要求，但政治上出現障礙，也會妨礙經濟和文化的正常交流。古代的絲綢之路，歐亞文化由這裏溝通，對雙方都有利。由於政治原因，戰爭的影響，這條路有時便不通，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也無從進行。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有千年以上的光輝歷史，有許多引起兩國人民美好回憶的故事。由於近代軍國主義好戰分子發動侵華戰爭，光輝友誼的畫卷一度遭到污損。

當嚴紹盪教授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出版之際，作為一個親身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又是從中日文化交流的曲折道路上走過來的中國的老一輩的學人，深知戰爭之可恨，和平之可貴。我祝願中日兩國人民、兩國的學術界，一定要以史為鑒，把中日文化交流推向健康發展的道路，共同迎接二十一世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中日兩國的學人共同努力，造福於全人類，責無旁貸。

1999年6月於北京寓所

序 言

朱川市

西漢劉向撰《別錄》，其子劉歆撰《七略》，是為中國目錄學之濫觴。此後，目錄學家代不乏人，目錄學著作蔚為大觀，書目的種類也逐漸增加。諸如國家藏書目錄、地方文獻目錄、私人藏書目錄、經史子集等各部之目錄，以及禁毀書目、鬻販書目等等，分類愈益細緻。晚清以降，中國學界多有出國訪書者，或近抵扶桑，或遠赴西歐，凡所經眼，撰為目錄，則又出現了一種可以稱之為域外藏書目錄的著作。

到日本訪書的學者，如黃遵憲、黎庶昌、楊守敬、羅振玉、張元濟、傅增湘、孫楷第等人，都有許多收穫。他們的著述，如楊守敬的《日本訪書誌》等，向為學界所推重。然而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中國古籍庋藏於日本各藏書機構和私人之手者不可勝計，若非全面調查詳加著錄，仍不能窺見全豹。嚴紹璽教授以其遠見卓識，早在二十年前就着手這項工作，前後赴日凡三十餘次，多方蒐求，訪得一萬餘種文本資料，焚膏繼晷，研精覃思，終於編成《日藏漢籍善本書錄》這一煌煌巨著。此中之甘苦，見其自序，讀者從中或可體會一二。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所蒐羅的書籍不僅遠比前人完備，而且著錄詳細，有關資料豐富，所下斷語審慎，是一部可以信賴的體大思精之作。關於日藏漢籍善本的目錄、版本、流傳等情況，本書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線索，可以供讀者進一步考察研究。書末五種附錄所提供的多方面的知識和信息，對讀者也很有參考價值。

日藏漢籍善本文獻價值，很值得注意。就我比較熟悉的一些集部善本而言，如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唐抄本《王勃集》殘卷，神田喜一郎原藏唐抄本《王勃集》殘卷，靜嘉堂文庫藏宋刻本《王右丞文集》十卷，靜嘉堂文庫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等等，都是從事古籍整理必須利用的重要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日藏漢籍善本不僅具有文獻價值，其背後隱然還有千餘年中日友好關係的歷史面影。嚴紹璽教授多年從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故能以不盡同於目錄學家的眼光，追尋中國文化東傳的軌迹，審視日藏漢籍所負載的文化意義。翻閱此書，仿佛可以看到一千多年間，汪洋之上，大小船舶，裝載着各種中國的書籍運往日本。其中有寫本，有刻本；有卷軸裝、有經摺裝、有蝴蝶裝、有綫裝；有官刻、有家刻、有坊刻。千軸百帙，紛紛總總，乘風破浪，登岸扶桑。這些書籍承載着中華文明，諸如

哲人的智慧、史家的學識、科學的發現、技術的巧思、文學家的翰藻、藝術家的才華，一起來到了東瀛，促進了日本文化的發展。而這些善本便是中日兩國和平友好的見證。

然而從日藏漢籍善本這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黑暗的一頁。自甲午戰爭以來大約半個世紀間，日本在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的同時，對中國的古籍大肆掠奪。日藏漢籍中，有許多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從中國劫奪而去的，也有許多是他們用各種手段巧取而去的。據嚴紹盪教授統計，僅僅從 1930 年到 1945 年這十五年間，中國文獻典籍被劫往日本的共計 23675 種，2742108 冊，另有 209 箱，內裝不知其數。這樣說來，日藏漢籍善本又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進行文化掠奪的證據。

嚴紹盪教授從中國古籍善本這一特定的角度，所揭示出來的中日兩國複雜的關係史，已經超出文獻學的範圍，而具有更廣泛的意義。讀者由此書所得到的啓示，也將是多方面的。

嚴紹盪教授與我交往多年，其治學之勤奮，思維之敏捷，學識之淵博，言談之暢快，每令我折服。近二十年來他不止一次談起赴日訪書的經過，往往使我想起了自己 1982 年在日本靜嘉堂文庫、天理圖書館等多家圖書館看書的情形。如今讀着他的大著，我當時曾經有過的種種感慨重新涌上心頭。中日兩國學者有責任以史為鑒，共同推進兩國關係在和平友好的道路上向前發展。

嚴紹盪教授的大著即將問世，囑我撰序。遂不揣謏陋，聊書數語，以表達尊敬與祝賀之意。

2005 年 8 月 12 日

序

尾崎 康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 名譽教授)

古代的日本經歷了很長的一段沒有文字的時代，大約在公元三世紀左右，才有了漢籍的傳入。據《古事記》等日本史書的記載，據說是百濟的王仁，把《論語》和《千字文》帶入了日本。其後，日本便開始了與中國的魏、南朝的交通。公元608年，日本派遣了“遣隋使”，公元630年起，更有了“遣唐使”。這些被派往中國的使節，爲了在日本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機構，他們活用了在當地所見聞的知識，與此同時，也就把漢籍帶回了日本，並積極地學習此類先進的文化。

就當時的海上運輸而言，運送典籍要冒很大的風險，因此，出使中國的使團帶回的漢籍，數量並不很多，然而，却多是具有很高學術性的著作。日本人對輸入的漢籍，抱着極大的尊重，並給予了充分的細心加以保管。

當時的宮廷中，設立了“校書殿”，這是一個對傳入的漢籍忠實地進行摹寫的機構。因此，日本至今仍然保存着唐鈔本、以及在奈良・平安時代摹寫唐鈔本的古鈔本——此種摹寫的唐鈔本，我們稱之爲“唐鈔本系鈔本”。日本古代摹寫漢籍的傳統，在中世的鎌倉時代和室町時代得以繼續發展。因而，即使有的唐鈔本本身已經失傳，但是，它的內容，却仍然可以準確地流傳於後世。

在日本的“唐鈔本系鈔本”中，其中已知有許多確是在中國已經失逸而僅存於日本的所謂“佚存書”。例如有名的有《文館詞林》、《群書治要》等。日本摹寫的這些“古鈔本”，其內容大抵都是精確的。唐代與唐代之前的典籍，在流傳中有了不少的訛誤，如果能把日本的這些“唐鈔本系鈔本”作爲校勘的文本，那麼，在校勘學上的價值，則是十分重大的。

在平安時代的中期，經由宋代的商人而將“宋刊本”傳入了日本。當時，這些中國商人，應日本方面掌握政權的藤原氏一族的道長、賴長等人的請求，而與之進行書籍貿易，這其中便有北宋本的《太平御覽》。《太平御覽》一書，在宋代原本是被禁止出口的，却被商人們走私到了日本。現今《太平御覽》的北宋刊本已經不存，而日本却尚存南宋刊本兩種，其中，一種存兩部，一種存三部。其後，經由日宋間的貿易和日本人宋

求法僧的活動，多種類多數量的“宋刊本”傳入了日本，像宋刊本《大藏經》，當時有福州的“東禪寺版”、“開元寺版”和湖州的“思溪版”，都已傳入日本，現今保存在日本的尚有十餘部之多。

如此豐富的漢籍，由大江氏、菅原氏、清原氏等博士家，以及鎌倉時代以京都和鎌倉的五山僧侶為中心的學者們，認真閱讀，精心研究。由於漢文（古典中國語文）與日本語文在文法上的差異，一般的日本人是不可可能閱讀漢籍的，於是，學者們創造了獨特的訓讀方式——此種訓讀方式，甚至延續到了現在，從而構成為“日本漢學史”的重大的特徵。

日本的古鈔本、流傳於世的宋元本，以及以宋元版為翻刻對象的日本中世時代出版的“五山版”與其後的“活字版”，由於在訓點，以及與它本的校合中，記錄了大量的引用文字，從而提供了貴重的漢學資料。例如，就《史記》而言，原《史記正義》的佚文，就在這些引用文字中被大量地採錄了。

在室町時代，幕府與地方大名都向元明派出貿易船。到了江戶時代，幕府大將軍雖然採取了“鎖國政策”，但是，却在與中國甚近的日本最西端的長崎，繼續同中國進行商業貿易。所以，中國元明清的刊本，仍然十分興隆地作為在長崎的貿易物品，成為幕府直接經營的事業。明清版中有不少是印刷精美的初印本，它們入境之後，大部分都是由江戶幕府的紅葉山文庫保管的。

正是這樣，日本自古以來輸入了大量的中國典籍，並且一直精心地保護着。當然，日本也有戰亂，也有天灾火事，並且因此而損失了許多典籍。然而所幸特別大規模的破壞，則是很少發生的，而且，由於日本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文化，一直是無比的尊重，並有志於從中學習一切有價值的養分，他們對於傳入的漢籍，則是高度的關心，愛護備至。因此，這些貴重的典籍，經歷了如此久遠的歷史，而得以基本保全，並且在學術上一直為日本的知識分子所活學活用。

中國北京大學嚴紹盪教授，把傳存於日本的漢籍善本，進行了準確而詳盡的“書錄”，它直接且具體地證明了我在上面所講述的日本對漢籍接受的歷史。本《書錄》以具有很高的學術性的資料，從一個方面闡明了日中文化交流的歷史，它在一個基本的又是特殊的領域中，把日本文化史介紹給了中國，並且有助於釋疑中國文化史上的未知的部分。

嚴紹盪教授長期以來對日本所藏的漢籍，進行了調查研究，他多次訪問日本，尋找在日本的寺社、宮廷、圖書館、大學、各文庫與私人手中的漢籍，實地勘查，並且不斷地發表調查研究的報告。我一直以極大的關心，注視着他的這一工作的進展，並且對此懷抱着深深的敬意。現在，嚴紹盪教授經過長期的努力，以扎實的書志調查為基礎，即將公刊他的大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我感到由衷的欣喜。

在日中文化交流的悠久和豐富的歷史中，我們迎來了二十世紀的終結。這個世紀的前半葉，日本的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反復地製造着令人痛心的事件，我們好不容易回到了和平友好的關係之中，在本世紀即將結束之際，嚴紹盪教授這一對於日本與中國的文化史研究都具有基本價值的著作得以誕生，我想，這是特別值得我們慶喜的。

1998年9月於日本 東京

自序

嚴紹璁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歷經二十年的調查整理和研究編纂，終於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了。

中國古代豐富的文獻典籍，是中華民族悠久而燦爛的文化的主要載體之一。自有甲骨文字以來，中國的文獻典籍便綿亘數千年而不曾中斷。秦漢以來，先是由於人種的遷徙，以後更有了文化流通的多種渠道，使中國的古文獻典籍得以在日本列島流傳。它一方面向日本民族傳達了中國的文化，一方面又為日本民族創造自己的民族文化提供了有意義的材料，其時間之恒久，規模之宏大，構成了東亞文化史上壯麗的人文景觀。

從中國文獻典籍東傳的歷史來考察，自西元前四世紀左右起中國大陸便陸續有居民向日本列島遷徙。自此以後，漢籍便作為大陸文化的載體，與人種的遷徙一起進入了亞洲最東部的這個島國。據西元八世紀成書的日本最早期的書面文獻《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載，大約在西元五世紀，當時的百濟人王仁攜帶《論語》與《千字文》等，經由朝鮮半島到達日本，並成為應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由此而開始了有記載的中國文獻典籍向日本的傳播。這位王仁先生，古日文用“真名”（此即指與“假名”相對的用漢字作為記音的文字符號——編著者）寫作“和邇”，日本口語讀若“wani”，無疑是一位中國籍朝鮮半島人，或者是一位祖籍中國的朝鮮半島人。當然，從日本平城宮遺址出土的木簡與西元五世紀前的日本原居民（Proto-Japanese）的生存狀態考察，事實上漢籍的東傳，一定是要比這兩部文獻的到達還要早得多。

此後，在至十九世紀中期之前的漫長的歷史年代裏，日本民族更通過政府使節，宗教僧侶，和以留學生為主幹的知識人，貿易商人，乃至平民百姓，他們或則橫渡東海大洋，或則經由朝鮮半島，船運車載，手提背負，歷盡艱辛，築起了漢籍東傳的橋樑。九世紀末，日本人藤原佐世以當時日本中央官廳和皇宮內天皇讀書處的藏書為對象，編撰了《本朝見在書目錄》，著錄中國文獻典籍凡一千五百六十八種。我國《隋書·經籍志》著錄典籍三千一百二十七種，《唐書·經籍志》著錄典籍三千零六十種。若與《本朝見在書目錄》相比較，那麼，在九世紀後期，《隋志》著錄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舊唐志》著錄的百分之五十一左右，此即相當於當時中國國內所存的文獻典籍的一半已經